
有关陈诚与武汉会战的两则史料

田子渝 吴海晶

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县人,字辞修,别号石叟。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后,经邓演达和严重援引,入黄埔军校,为上尉特别官佐,担任教育副官一职。以此为契机,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因其战功,屡屡升迁,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他已是蒋介石特别倚重的军事将领,加陆军上将衔、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参加指挥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鄂西会战、豫中会战等重要战役,负责策定中缅远征军。1948年年底,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以后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院长”,成为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

在“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研讨会”时,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将海外友人赠送给他有关陈诚与武汉会战的两则史料提供给研讨会。这两则史料,一为陈诚撰写的《抗日战争中的武汉战役——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五日》(以下简称《武汉战役》),一为他人按纪年体撰写的《陈辞修先生言行纪要——民国二十七年六月至十月》(以下简称《言行纪要》)。这两份史料虽然作者与记事角度不同,但反映的都是同一段历史——武汉会战。陈诚是这场重大战役的核心人物。九一八事变后,他就奉命修筑武汉要塞。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最高统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节武汉,武汉遂成为抗战的临时首都。

1938年元旦,蒋介石特令组织武汉卫戍司令部,负责武汉地区及其周边的国防工事。陈诚出任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6月12日,安庆失守,武汉会战序幕由此揭开。第三天(14日),蒋介石命令组编第九战区,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次日(15日),国民政府复命他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全省保安司令、湖北省军管区司令。这一时期,他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等要职。

以上两份史料真实记录了武汉会战,再现了60年前发生在荆楚大地上中国人民奋起抗击强敌入侵,浴血御侮的辉煌一页。这两份史料在大陆是首次披露,笔者有幸先睹为快,并承蒙章开沅教授同意,特加以评介,以飨读者。

一、全面记述了第九战区在武汉会战中的作用。

(一)说明进行武汉战役的背景。1938年5月19日中国军队从徐州主动撤退后,武汉就成为日军的主攻目标。日军根据既定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制定将中国军队主力歼灭在武汉的作战计划,“以为如果占领了武汉,中国的战志和战力,均将消灭殆尽,‘中国事件’自再无拖延的可能,将按照他们所期望的当真可要胜利结束了。”(引号内的话,均摘自以上《武汉战役》和《言行纪要》,下同。)为此,日军定下8月15日为解决武汉战役的最后时间。

对日本攻占武汉的战略目的,中国统帅部有清醒的认识,早在南京战役即将结束之际,便在《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中决定:“国家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目标。”陈诚等根据战局的变化,对日军进攻方向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由于花园口之黄河决口,阻挡日军从北面进犯武汉,日军进攻武汉将沿长江两岸取“大包围”的态势,一路沿长江两岸,在空海军的支援下,由东进犯武汉;一路“取南昌、长沙、岳州,以截断粤汉路,包围武汉”;一路“由皖北分道西犯,截断平汉路,突破大别山,以进逼武汉”。为

此中国统帅部制定武汉战役计划,其要点:“为达成保卫武汉,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浔路线,以主力控制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无论如何变化,我军务立于外线作战地位,与敌作战,确保机动之自由,至万不得已时,以卫戍部队固守武汉,主力应转移武汉外围,以求夹击敌军而聚歼之。”

为实施以上战役计划,中国统帅部决定在武汉卫戍司令部的基础上组建第九战区,与第五战区成为承担武汉会战的主力部队。长江以北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武汉沿江暨长江以南”的防务由第九战区负责,划定湖口至南昌以西及长江以南为作战地带,其使命是“拱卫武汉,达成长期抗战,在武汉外围,利用有利地形,极力消耗疲惫敌人,乘机予以局部歼敌”。陈诚据此下达作战命令。第九战区下辖第一、第二兵团和用作预备队的直属部队。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上将,共有10个军,25个师以上的兵力,防守南昌一线并鄱阳湖星子设防;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上将,共有14个军,28个师以上的兵力,沿长江设防,将主力安排在瑞昌、德安、九江一线,以阻敌军西上及登陆。此外以8个师为武汉之保卫部队,第三兵团拨归第五战区。由此可以看出第九战区在会战中所起重大作用。

(二)记叙了第九战区武汉战役过程。《武汉战役》主要记录江南战场的战况。6月12日日军进攻安庆,开始武汉战役。6月下旬,陈诚身临战地,指挥江南战场。7月25日,日陆军在海空军协助下,从九江登陆,至此江南战场序幕拉开。日军进攻九江后,将主力攻瑞昌,再占领武宁,以迂回武汉;以一部沿南浔路南下,企图占领南昌,“以震撼我长(长沙)衡(衡阳),切断我浙赣路”;另以海军舰队溯江西上,企图随时随地登陆,以与日陆军、空军协同作战。第九战区在江南战场布置的兵力达20多个师(与敌兵力之比为10比

1), 开辟了5个战场: 南浔路一个战场, 星子、庐山一带一个战场, 瑞武路一个战场, 瑞阳路一个战场, 沿江岸一带一个战场。陈诚制定的基本战略是守势战略, 要求各部队“要守其所必攻, 还得要守其所可能攻”。同时“当孤军深入之际, 要捕捉战机, 断其归路, 聚而歼之”。这后一作战方针指导万家岭战役取得成功。10月7日—10日中国军队经过3天3夜激战, 在介于瑞武公路与南浔铁路之间的万家岭将被围敌军约4个联队1万余人歼灭, 取得继台儿庄大捷之后的又“一次很辉煌的胜利”。万家岭大捷也是武汉会战中“最辉煌之胜利”。

万家岭大捷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局敌强我弱的态势。10月中旬武汉局势日趋严重, 10月12日北方之敌占领信阳, 武胜关旋告不守, 武汉北大门洞开。第九战区方面, 日军于10月19日攻占大冶, 武汉告急。21日第九战区作反攻部署, 调动万耀煌第二十五军3个师和第七十八军2个师, 为第一攻击纵队, 沿瑞武路反攻瑞昌; 以汤恩伯指挥的李仙洲、张冲、霍揆彰等3个支队, 编为第二攻击纵队, 策应反攻瑞昌, 向阳新攻击前进; 以关麟征指挥之张刚、甘丽初2个支队, 编为第三攻击纵队, 反攻大冶。攻击时间定在10月25日拂晓。但前一天中国统帅部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 该作战计划取消, 武汉会战也就落下帷幕。

二、总结了武汉会战的意义及经验。

(一) 武汉会战的意义。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坚持了4个半月, 歼敌20余万, 给敌沉重打击, 一再挫败敌军作战计划。日军原规定8月15日攻下武汉, “后又言9月内一定占领武汉, 直至10月末, 我计划撤出, 敌始得偿如愿”。因此, 武汉会战对中国转向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陈诚是一个军人, 更多是从军事角度看问题。他认为武汉会战的另一个意义就是中国军队的战力有了提高。这从与淞沪——南京战役相比就十分清楚。九江至武昌, 其距离比上海至南

京为短,上海撤守到南京失陷,仅一个月时间;而“这次武汉会战,由九江至武昌之间的战斗,历时3个多月,两相比较,敌军的攻势,显然已经顿挫,我军的守势,显然已有进步”。虽然中国军队最终撤出武汉,但有“越战越强的表现”,“敌军则厌战情绪渐深”,速战速决“结束‘中国事件’的希望,已自知其甚为渺茫矣”。

(二) 武汉会战需要推行全民总动员。战争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较量,而是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总体战争。陈诚强调“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在总结武汉战役时,专门列此问题加以总结。他认为战争必须调动“一切能利用以抗敌者,务必全体动员,在所不惜。而同时不应牺牲者,以及足资敌利用者,虽一草一木,亦不应轻易委弃之”。全民总动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动员整个社会所有力量团结起来抗战,主要有战区民众之动员、推行普遍宣传、训练民众、组织民众、积极建立民众武装、民众自卫、整饬地方官吏、加强军队政训等,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谓有钱出钱,应由上中层分子,切实觉醒,人人抱定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决心。所谓有力出力,必须顾及人民之家庭状况及其生产情形,以资平允,而免引起社会之混乱”。另一方面是组织一切物质为战争服务。主要有管制物质、公私企业内迁、管制交通、疏散人口等。

(三) 战略和战术上的检讨。武汉会战的失败虽是预料中的事情,但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首先是战略与战术的统一问题。由于敌强我弱,因此决定敌方取战略进攻态势,我方取战略守势,具有防御性质。从消耗敌军,进行持久战略的角度看,武汉会战是成功的,但战术的运用则有很大缺点。战术必须服从战略,抗日战争“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这主要是中国军队“备多力分”,虽然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将主要兵

力守阵地,机动兵力却不占优势,加上装备训练又居劣势,制空权完全操在敌军之手,因此往往处于被动。“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万家岭战役就是战略与战术守攻辩证转化成功的范例,“可惜这种战机不多,否则,武汉也许不会撤守了”。

其次是协同作战问题。在现代战争中,协同作战是“作战致胜的一大要诀”。协同意识首先要高级军官头脑中树立。但一些军事长官却出于保存实力的“自私”观念,偏偏各自为战;有的部队当友军危急时,接到援助命令,从自私角度也多敷衍塞责;再如两军衔接处,“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为敌所乘”。敌军对中国军队这种“恶习”已熟知,讥笑中国陆军只有一个师(指一个师一个师的单独作战,缺乏协同意识)。他们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往往有效。协同意识另一层意思在各军种的协同作战。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要求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是中国军队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敌军强于中国军队的地方。长江原是阻挡敌军进攻的“天堑”,但因我海军薄弱,“天堑”反而资为敌用,成为敌海军进攻我军便利的交通线。为防止敌军进攻,沿江布置了大量的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再加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之手,在阵地作战的陆军,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武汉会战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无事”。

最后是“精兵主义”问题。“精兵主义”是现代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陈诚根据抗日战争的各战役,尤其是对武汉会战的总结,指出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中

国军队无论哪一次战役中,在数量上都超过敌军,如第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 70 多个师,而敌军总计不过 7 个师团,只有中国军队的 1/10,但往往“能以少击众者”,原因就在军队的素质。因此“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

综上所述,《武汉会战》和《言行纪要》的史料价值主要有两点:

第一,从一个主要面真实记录了武汉会战。大陆方面有关这一重大战役的史料公布不多,主要集中在两本书,一本是江苏古籍出版社于 1987 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册),一本是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武汉会战》,前者是电文,后者是国民党参加武汉会战军政人员的亲历记。第九战区是武汉会战的主力之一,因此这次战役的主要战场之一的最高军事指挥长官的回忆资料和记载他言行的资料,无疑为大陆学者增加了可资利用的研究素材。值得强调的是,《武汉战役》还记载了一些日军方面的资料和中国统帅部的电文,因而其史料价值更加珍贵。

第二,记述了陈诚在武汉会战期间主要经历。陈诚是国民党显赫人物,在民国史和国民党史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大陆方面、还是台湾方面,对他的研究都不充分。武汉抗战时期是陈诚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执掌军政大权,“保卫武汉的重大责任,几完全集中于”一身,其作用仅在蒋介石之下。在寇深祸极之际,他请缨御侮,抗击倭寇,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其功不可没。这两份资料则比较可信地反映了陈诚这段热诚爱国的历史。

(作者田子渝,1946年生,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吴海晶,1952年生,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